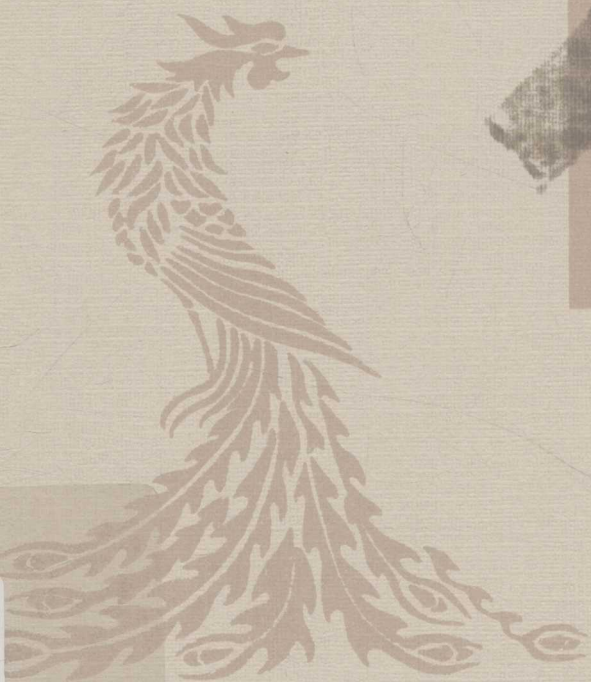


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

总主编 杨胜宽 蔡震
本卷主编 税海模 蔡震

卷十三

研究之研究卷



郭沫若研究文献汇要

卷十三

研究之研究卷

总主编
本卷主编

杨胜宽 蔡震
税海模 蔡震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顾问

章玉钧 谢保成 谭继和
魏建 李怡 王锦厚
祁和晖 彭邦本 魏红珊

总主编

杨胜宽 蔡震

分卷主编

《总论卷》：税海模 蔡震

《史实卷》：廖久明

《交往卷》：廖久明

《思想文化卷》：陈晓春 王海涛

《文学·诗歌卷》：雷业洪 张昭兵 陈俐

《文学·戏剧卷》：陈俐 杨兴玉 何玉兰

《文学·小说、散文、中外文学比较卷》：陈俐 邓芳

《历史卷》：何刚

《考古、古文字卷》：陈仕益 杨晓宇

《教育、新闻出版、书信、书法卷》：廖久明 熊泽文 王立新

《研究之研究卷》：税海模 蔡震

其他参与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天乐 于立得 万保君

邓帮云 令狐兆鹏

陈大川 杨宏 李畅

余玲 张远东 苟兴朝

罗春 赵学彬 徐立昕

唐瑛 卿玉弢 龚盖雄

凡 例

一、本汇要收录郭沫若研究文献的时限为 1920 年至 2008 年。

二、本汇要收录的是国内发表的研究郭沫若的代表性文章；考古、古文字方面的回忆文章，如包含有不可或缺的评论文字，则予节录收入。

三、本汇要优先选择具有原创性和史料性价值的文章，后来发表者如包含了更丰富的内容则酌情选录。

四、郭沫若研究的重要著作按存目处理，其他著作中与郭沫若研究有关的章节均按单篇文章处理。

五、同一专题的文章以发表先后为序集中编排（“史实卷”则以相关问题的时段性为序编排）。

六、为了全面反映 90 年来郭沫若研究的总体状况，凡符合以上标准的文章都在入选之列，以期尽可能充分地反映各种学术观点。

七、为了尽可能地保留文献的本来面目，反映其时代特征，仅对以下三种情况进行更改：（一）竖排改为横排、繁体字改为简体字；（二）脚注、尾注、参考文献统一置于篇末；（三）明显错误的字词、标点符号等。

目 录

在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 扬	1
建国三十五年来郭沫若研究述评	秦 川	6
郭沫若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桑逢康	16
“郭沫若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讨论会简介及部分代表		
发言摘登(节录)	杨均照整理	28
郭沫若史学研究当前史学发展趋势		
——郭沫若史学研究讨论会简况	荣丽华 钟作英整理	42
郭沫若历史剧研究述评	魏 建	47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待郭沫若和郭沫若研究	阎焕东	64
郭沫若研究的历史回顾(节录)	高文平	79
关于郭沫若研究的几个问题		
——十年来郭沫若研究专著一瞥	何益明	87
在文化审视中拓宽研究领域(节录)	林 林	98
深入郭沫若研究的浅议	马识途	100
郭沫若研究的现状应当改变	谢保成	105
“以鲁视郭”心态批判		
——从郭沫若“薄海民”特征说开去	陈方竞	112
关于郭沫若研究的漫谈	蔡 震 高远东 刘 纳 冯 奇	123
郭沫若研究三十年述评(上)	卜庆华	142
郭沫若研究三十年述评(下)	卜庆华	154
郭沫若文学研究的昨天与今天	黄侯兴	167
国外郭沫若研究述略	秦 川	190

郭沫若文学研究十五年	魏 建	20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沫若学的建立	谭继和	216	
关于建立“郭沫若学”的我见	祁和晖	224	
“郭沫若研究及其发展趋势”学术研讨会综述	木 生	229	
喧嚣与寂寞			
——重识郭沫若	阎延文	236	
浅议有关郭沫若的两极阅读现象	温儒敏	242	
郭沫若文学研究五十年	朱寿桐	250	
郭沫若研究述评	刘 勇 李春雨	265	
关于创建郭沫若学的思考	税海模	284	
读了三篇写“文革的郭沫若”之后	于光远	296	
对“球形天才”的再思考			
——世纪之交看郭沫若研究与评价	刘悦坦	301	
他们为什么要丑化郭沫若			
——从“政敌”的污蔑说到“乡梓”的辱骂	曾绍义	311	
对郭沫若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陈晓春 乐斯谟	322	
郭沫若研究的潜在价值及其生态优化与范式突破	税海模	330	
“郭沫若研究方法论”笔谈	杨胜宽 陈晓春 税海模 陈 俐	343	
新时期鲁迅与郭沫若研究述评	魏 建 赵 强	357	
“郭沫若与日本”在郭沫若研究中	蔡 震	374	
关于郭沫若研究文献的思考	税海模	387	
一切遗物皆史料			
——谈郭沫若作品汇校本的出版	廖久明	400	
郭沫若研究三议	蔡 震	408	
郭沫若研究的双重“祛魅”	税海模	416	
附录：郭沫若研究专著、论文集(书目汇要)			420
后记			428

在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 扬

刚才石西民同志讲了话，谈到研究会将要进行的工作。我是很年轻时候受到郭沫若的影响，对他可以说是很有感情的。郭沫若研究学会到底怎么办？还有几天时间大家可以讨论这个问题。研究同时代的伟大作家有它的方便和困难，研究郭沫若也不例外，因为同时代的人牵扯到各种关系，因而就有各种看法，难免夹杂感情的色彩。正因为这样，才更应该把它当作科学的课题加以研究。郭沫若是代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位杰出人物。讲到我们的文化传统，一方面有五千年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有不到一百年的新文化运动。这两类传统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两种传统，一个是五千年，一个是不到一百年，后者比前者离今天更近，对今天的影响更直接，因此更应该大力研究。特别是像郭老这样一位作家，又是文学家、又是剧作家、又是历史学家、又是古文字学家，涉猎的方面很多，所以更值得我们很好地分门别类地研究。

文化事业同整个革命事业一样，要走自己的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认为这是我国文化工作的总方针，总的奋斗目标。学会建设这种文明，学会领导和组织这一精神文明建设，需要一个过程。文明、文化是不能靠强迫命令建立起来的，它需要发挥每一个人的创造性，需要经过群众性的讨论研究。因此我赞成成立郭沫若研究学会。当然，现在有些学会也有缺点，好像太滥。滥了不好，但学会还是需要的，并非滥竽充数的学会不但需要，而且十分需要。这种形式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和提高。学会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同意见，会有争论，这个没有坏处。没有争论、争鸣，学术怎么能繁荣发展起来呢？既然是学会，就是科学性的组织，所以研究郭沫若第一位的是讲求科学性，要有历史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要承认郭沫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功绩和贡献。

既不要有溢美之词,更不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郭沫若的学术成就范围很大,在某种意义上,他可以算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不仅在诗歌、戏剧、小说等方面开拓了一代新风,而且在历史、考古、古文字学等方面也有着特殊的贡献。他是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第一人。他在文艺创作和理论科学两大门类中都兼有所长。所以在开国以后,他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和国务院文教委员会负责人,是当之无愧的。我们对郭沫若研究可以从更多的方面分门别类搞。

研究当代作家,特别是当代伟大作家不容易,在某种意义上比研究古代作家还麻烦。当代作家有的还活着,或者同他有关系的人还活着,正因为是朋友、熟人,研究时难免夹杂一些感情。当然,科学研究也不能没有感情,特别是对历史人物的研究,需要有感情,革命的感情嘛。但不能感情用事。没有革命的感情怎么能研究郭沫若,研究鲁迅、茅盾呢?这同科学性不矛盾,恰恰是一种需要,一个条件。对郭沫若的研究应该有热烈的感情。

“五四”以来有人把“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分为两大流派,我看是可以这样看的。问题是具体研究一下这些流派的产生、发展趋势及其影响。很多人,包括我们这样年纪的人都受了郭沫若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是郭沫若的这种革命精神培育起来的。研究郭沫若可以按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两种流派进行研究,这两种流派都有它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因素。现在大家都承认现实主义是最好的方法,但它也有自然主义的流弊。我们对茅盾是很称赞的,他对这个自然主义也有所自我批评。

郭沫若是文学家,是以浪漫主义者的姿态开始他的文学创作的。我跟郭沫若同志谈过,科学好像不能有浪漫主义,但科学应该有幻想,有革命的感情。研究郭沫若的一生,不能离开他整个思想感情以及毕生伟大的革命实践,如果离开这些就不能正确认识郭沫若。郭沫若是感情非常丰富的,那时候我们受郭沫若的影响,也是在这个丰富的感情上受的影响。当然也可以产生不够冷静、不够科学的毛病。但郭沫若对无产阶级,对革命、对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感情贯穿了他的一生。如果在这方面有缺点,也是一个伟大战士的缺点。

我们对郭沫若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伟大的文化巨人，伟大的革命文学家。郭沫若的功劳就是用他的著作、行动来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搞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简单的事情。像我们这些人，像我们这些年纪大一点、老一点的，受过各种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封建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的形形色色无所不有。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新的信仰，对郭沫若来说也是新的信仰。但郭沫若比我们强，因为他有丰富的历史知识。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不容易的。许多人都以历史唯物主义者自诩，但是真正做到这一点却很难，对历史上的事情都能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判断，这是很难的。首先一个问题是掌握历史材料没有？如果你没有掌握材料，没有这个“物”，怎么能算是历史唯物主义呢？所以我今天讲，是表示一种愿望，要做个历史唯物主义者，首先要掌握大量历史材料。郭沫若就有这个条件，鲁迅更不用说了，他们都是掌握了中国的历史知识，非常丰富的历史知识。是不是我们把做历史唯物主义者作为努力目标提出来？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应当努力去做，要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嘛。历史唯心主义、机械唯物论我们都不搞。过去写的东西，机械唯物论不少喽！所以要做到这一点：既不是历史唯心主义，又不是机械唯物主义，不是很容易。

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容易的事。信仰上可以说你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为此你可以付出生命。但是思想上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还很难说。在我们中间，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很彻底的，但在他的晚年，唯物主义也没有贯彻到底，某些方面还走向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讲到了。我们在座的很多同志都相信毛泽东同志，甚至相信到迷信的程度，这是后来才觉悟到的，知道了自己不高明嘛。可见做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很难的事情，要终身努力、终身行事。一九四六年到上海去的时候，有个三十年代的老同志问我：你在延安整风的时候有什么收获？我想了很久，要讲心得只有一个：经过整风认识了自己还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现在我还是讲这个话，隔了三十多年了，我还是说：做个马克思主义者不容易。拿这一点来勉励大家，

也勉励我自己。

那天一氓同志提到两篇文章,回去以后我一看确实写得不错,就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评价当时的功过,充分肯定了“左翼”的功劳,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现在有一种倾向,好像“左翼”搞错了。我认为应该用历史的观点来评价“左翼”文艺运动,否则怎么能正确评价呢?现在舆论界,特别是国外有一种倾向:专门把受过“左翼”批评的人抬得很高。恰当地批评,纠正我们“左”的错误是完全需要而且应该的;但贬低“左翼”专门抬高“左翼”以外的东西就不合适了。最近听说梁实秋很怀念北京,想回来。站在统一战线的立场,我们欢迎他回来。当时鲁迅和梁实秋论争到底谁是谁非,是非界线不能模糊。他不是敌人,过去把他当成敌人。在某种意义上讲,在思想上把他当作敌人,那是对的;现在不是敌人是朋友,他要回来,我们欢迎他;但过去批评他并没有错,鲁迅也好,创造社也好,对他的批评都是对的。所谓不对,就是方法上可能有缺点:可能有点“左”的情绪,还有一点就是不大讲策略。我们的缺点,主要是这两条。

鲁迅的文章也不是毫无缺点的,他的话不可能句句是真理。但他讲策略,比我们讲策略,这点鲁迅比我们高明多了。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需要掌握党的策略思想。

评论前人的功过,不要因为革命运动犯过不少错误,犯过今天听起来像是很可笑的错误,就对历史做出不正确的估价。譬如从事文学革命、从事“左翼”文艺运动,在当时是非常严肃的,为这种运动不惜牺牲生命,不只是不惜生命,而是牺牲了,而且牺牲了很多人啊!对这样的历史,我们不做正确估价,听任一些人妄加评论,把“左翼”说成还不如梁实秋啊,还不如胡适啊!一些缺乏历史知识的年轻人也就相信了这些。这样地对待历史,就完全不是唯物主义,完全不公道了。

一氓提到的那篇文章是讲郭沫若的时代,现在的时代不同了。几十年过去了,还有没有资产阶级思潮呢?五十年前是有这种思潮的。马克思主义诞

生于资本主义时代，它的创始人跟各种资产阶级派别进行了斗争，进行得很漂亮。马克思去世以后，我们也进行了这种斗争，不过有的时候不见得那么成功了。现在仍然有资产阶级思潮，我们要进行斗争。怎样学会更好地斗争？就是知己知彼，敌人也好，朋友也好，首先要了解他们。

鲁迅谈到《中国青年》上有一篇文章，对朋友讲得很多，对敌人讲得很少，鲁迅认为应该更多的了解敌人。在当前新的形势下，重新分清敌我、是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

现在和五十年前、三十年前不同了，情况复杂了。最近思想界一度流行“萨特主义”。有人说鲁迅也是存在主义，我们听起来觉得是很荒唐的。什么主义也好，凡是流行的东西，都有一种吸引力，一些较年轻的同志，觉得这是“新生事物”，所以鲁迅也变成存在主义了。

所以我们对任何新出现的事物都要加以注意和研究，不要想当然地乱捧或者乱骂一通，这不是正确对待问题的态度。我们要先了解他们究竟讲了些什么，在充分掌握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判断。马克思主义者要继承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财富，包括当代资产阶级所创造的文化财富。但马克思主义者要有自己鲜明的思想旗帜，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剥削阶级的思想混同起来，更不能把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当作自己的思想旗帜。

这次会开得很好，大家讲了很多好意见。我相信，经过大家共同努力，学会一定能搞起来。有这样一个好的开端，一定能把这项工作做好。

（原载《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专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8月）

建国三十五年来郭沫若研究述评

秦 川

郭沫若是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和戏剧家，又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博大精深，才华横溢，在文学和史学等许多领域都处于开拓者的地位，有多方面的重大建树。同鲁迅一样，郭沫若是无产阶级的文化巨人，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他为我们留下了一千多万字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开展对郭沫若及其著作的研究，意义极为重大。

建国三十五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郭沫若的研究，概括而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诗歌、历史剧和前期思想发展。回顾历史，这三方面的研究工作解放以前就开始了。诗歌的评论开始很早，如一九二一年八月《女神》诗集出版，立即就有郑伯奇的长文评介。一九二二年底又有闻一多的两篇评论，给《女神》以很高评价。其后三四十年代，钱杏邨、朱湘、蒲风、周扬等也相继有文章发表，都比较一致地肯定了《女神》开一代诗风和郭沫若在新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在历史剧方面，常常也是作品一发表就立刻有评论出现。解放前后都如此。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爆发期是在四十年代。围绕他的历史剧创作，特别是《屈原》的创作和演出，曾展开过激烈的论战，在当时实际是一场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政治斗争。进步文化界肯定了郭沫若历史剧创作的战斗作用和“以古鉴今”、“古为今用”的创作原则。毛泽东同志对郭沫若在抗战时期的史剧和史论充分给予估计，称他的史剧、史论“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解放前还对郭沫若的前期思想发展有过研究，但开始较晚，最早一篇《诗人郭沫若》，是钱杏邨在二十年代后期发表的。专论很少。对郭沫若作全面评价是四十年代初为庆祝他的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时才开始的。最重要的文章是周恩来同志的《我要说的话》。文章说：“鲁迅是新文化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

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并指出郭沫若既是革命的诗人,又是革命的战士。赞扬他有“丰富的革命热情”,“深远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战斗生活”。这些评论,可以说是解放前对郭沫若研究的一个相当精辟和全面的总结。周恩来的讲话和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也一直是解放后郭沫若研究工作的指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郭沫若研究也进入了新的时期。三十五年来,郭沫若研究不断发展、深入,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三十五年中,郭沫若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6),即解放后的前十七年。十七年中,各类的郭沫若研究文章共发表三百多篇。在诗歌方面主要是《女神》研究出现了新的成果。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一版再版的楼栖的专著《论郭沫若的诗》,虽然篇幅不大,但它力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郭沫若的《女神》等几部诗集及其诗歌创作道路、前期世界观和文艺观作较全面的分析和评论,不乏独到见解。它的不足是明显的,诚如作者所言:“分析不深,论述不透。”特别是关于郭沫若的泛神论世界观和所谓“纯艺术观”问题,曾在后来引起过较大的论争。在历史剧方面,一九五八年发表的陈瘦竹的专论《郭沫若的历史剧》,在作了比较深入的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郭沫若所写的历史剧,主要都是悲剧”的论点,并对它的美学意义进行了探讨。他指出这种悲剧,如《屈原》,不仅是屈原“个人的悲剧”,也不仅是“楚国的悲剧”,“而是我们民族的悲剧”。郭沫若的全部历史剧,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许多历史人物“高贵的、严肃的、雄伟的、壮丽的悲剧精神”。一九七九年他又发表了《再论郭沫若的历史剧》一文,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论点,指出“郭沫若的悲剧观念,来自对于中国历史的科学分析”。郭沫若说,战国时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许多志士仁人,为了争取“把人当成人”,前赴后继,“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具有一种“悲剧精神”。中国历史上的这种悲剧精神,就成为郭沫若历史悲剧创作的基础。一九五九年郭沫若发表了《替曹操翻案》一文和历史剧《蔡文姬》,一九六〇年又发表了历史剧《武则天》,在全国范围的史学界和文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论争。历史界比文学界的讨论更加广泛、深入。由

替曹操、武则天翻案开始蓬勃地兴起了重评历史人物的活动,并进而形成了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理论探讨的高潮。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吴晗等都积极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这场群众性的讨论纠正了过去史学界存在的“只讲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否认统治阶级个别人物的历史作用”的偏向,标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界的新进步”。文学界主要集中讨论了历史剧创作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史实与虚构的关系问题。在历史方面,三联书店出版有《曹操论集》;历史和文学方面,中华书局出版有《胡笳十八拍讨论集》;历史剧方面,则有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茅盾的《关于历史和历史剧》。茅盾的专著不是具体评论郭沫若历史剧的,但它出版于一九六二年,并以总结解放后历史剧创作为目的,因此实际上也包括了对郭沫若的新作的经验概括在内。茅盾强调“历史剧既是艺术又不背于历史的真实”的原则。并就当时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历史剧在解放后是否也负有对人民进行历史教育的任务,表明了肯定态度。他认为作家在“构思运笔”时,既取材于历史就不能不“忠实于历史”,“正像他写现代生活的作品必须忠实于生活一样”。大凡“牵涉到改写历史,所关非细”的虚构,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前十七年的郭沫若研究同其他战线一样,也曾受过“左”的和简单化的倾向影响,存在着某些明显的不足和问题。

第二阶段(1966—1976),即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十年动乱,郭沫若研究基本处于停止状态。十年中,除郭沫若新著《李白与杜甫》一书出版外,几乎没有什么文章发表。

第三阶段,自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迄今。这八年可以说是郭沫若研究经过恢复、发展,真正走向全面深入开展的新时期。这个阶段有三件事对郭沫若研究有重大影响:一、一九七八年六月,郭沫若逝世后,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的《悼词》,是继《我要说的话》后,对郭沫若全面、科学的定评。悼词指出,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倡导的无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全党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思想上和理论上为郭沫若研究的全面深入地开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三、全国

和乐山、四川、山东等地郭沫若研究学会的成立,四川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乐山师专和全国的郭沫若研究室的建立,从组织上、人员上保证了今后郭沫若研究的持续开展。特别是自一九七九年郭沫若逝世一周年四川大学和乐山联合举办首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后,四川、山东和全国又相继召开了几次具有全国规模的学术研究会,更有力地推动了郭沫若研究的发展。

这个阶段的头两年,即郭沫若逝世前,是郭沫若著作出版和研究工作的恢复期。这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诗集《女神》,新版了《沫若剧作选》等;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了楼栖的专著并附录了论文《再论〈女神〉》。该文对“四人帮”妄图抹煞“五四”新文学成就和张春桥攻击《女神》的谰言,是一次反击和清算。郭沫若逝世后,为纪念郭老,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大量回忆、悼念文章,郭沫若生前的战友、同事和亲属等的回忆,如吴奚如等关于他的入党问题的回忆,阳翰笙等关于他在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战斗生活的回忆,以及学术界对郭沫若生平史料、书信等的搜集整理,都为郭沫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三联书店还汇编出版了《悼念郭老》一书。近几年郭沫若研究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期。据不完全统计,郭沫若研究文章达千余篇,是解放后前十七年发表文章总数的三倍多;又出版了一批学术性专著和资料,改变了前十七年仅有个别著作出版的面貌。如上海、天津、山东、湖南等地出版社出版的陈永志的《试论〈女神〉》和《郭沫若传略》、黄侯兴的《郭沫若的文学道路》、谷辅林的《郭沫若前期思想及创作》、卜庆华的《郭沫若评传》,龚济民、方仁念和王继权、童炜纲的两部《郭沫若年谱》、张澄寰的《郭沫若论创作》、曾健戎的《郭沫若在重庆》等,都比较系统,各具特色。另外,出版了一批郭沫若的新作、佚文和作品选集,如四川出版的《东风第一枝》、《蜀道难》、《樱花书简》、《郭沫若少年诗稿》、《郭沫若集外序跋集》、《郭沫若选集》及儿童读物《郭沫若作品选读》等;在版本研究方面,也出版和即将出版《郭沫若著译书目》、《〈女神〉汇校本》、《〈棠棣之花〉汇校本》、《〈文艺论集〉汇校本》等;由全国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出版的《郭沫若全集》,分文学、历史、考古三编,共三十八卷,也正加紧注释定稿和编辑出版中。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和四川大学学报编

辑的《郭沫若研究专刊》已出版四辑,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郭沫若研究论集》、山东曲阜师院的《沫若研究》均已出版二集,乐山的《郭沫若研究学会会刊》已出版三集,北京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主编的《郭沫若研究》大型学术刊物创刊号也即将问世。此外,尚有一些专著和著作选编将于近期内陆续出版。

总之,近几年郭沫若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初步形成了一个以中年知识分子为基干的研究队伍;研究的领域由原来的诗歌、历史剧和前期思想扩展到包括郭沫若创作和历史学术著作在内的各个方面;研究成果由单篇散论发展为较系统的专门著作;研究的方法和角度也有发展,不单注重微观的研究,也重视从历史、社会和思想的角度作宏观的研究,或比较研究,等等。诚然,这还仅仅是个开头。正如王瑶所指出的:“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对一些著名篇章作出细致的分析或评介,而应该要求有这样的著作出现,它能够在广阔的社会文化历史的背景下,对作家的发展道路、创作倾向和艺术成就,作出全面的科学的综述和研究,但这在目前显然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他认为黄侯兴的《郭沫若的文学道路》一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们研究工作中的不足”。王瑶从理论上提出的浪漫主义历史剧观和创作方法的新论,华忱之对郭沫若抗战杂文的研究,高国平、吴功正、王大敏等对其历史剧的研究,张毓茂、刘元树等对其小说、传记、散文的研究,戈宝权、吕元明等与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的研究,王世德、王富仁、罗纲等对其美学思想的研究,殷鼎关于郭沫若早期哲学思想的研究,等等,或开拓了新的领域,或填补了郭沫若研究的某个空白,使郭沫若研究又进了一步。

近几年来,由于国内外种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在郭沫若研究中曾出现过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不尊重“五四”以来特别是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革命文学传统,肆意贬低和攻击鲁迅、郭沫若这些开拓者,随意抬高胡适等资产阶级代表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一九八一年前后,某些报刊发表了个别对郭沫若随意斥责的文章。如《评〈甲申三百年祭〉》的长文,把早有定评的《甲申三百年祭》说成是“在中国特殊土壤中产生”的,“不严肃、不谨严的学风”的代表作。有的文章硬说《蔡文姬》一剧和《替曹操翻案》一文,是“臆造历史,粉饰太

平”，是什么“以古媚今”。在有关《李白与杜甫》一书的争论中，也出现了“颇有微词”的文章。很明显，这些指斥并不是实事求是的，出发点也不在学术讨论，借用某个批评者的话说，“而是政治上的原因”。这些错误倾向引起了郭沫若研究界的注视，迫切感到如何用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研究郭沫若非常必要。一九八二年，周扬在《纪念郭沫若诞生九十周年和庆祝郭沫若故居开放》的讲话中指出：“鲁迅和郭沫若两人在我国现代革命文化史上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他们的著作不仅属于过去，而且属于今天，属于未来。当然，任何伟大先驱者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他所处时代以及他本人的局限性。这是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加以正确说明，而不能苛求于他的。”周扬在讲话中还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和概括，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作为发展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和借鉴，是我们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从而为郭沫若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指明了方向。

近几年出现的几次较大的学术论争，包括上述有关《甲申三百年祭》、《李白与杜甫》及郭沫若历史剧问题的论争，除极个别外，都能实事求是地、历史地把郭沫若的著作和是非功过，放到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加以分析、评论、研究。既不掩饰，也不夸大；用事实说话，以理服人。如顾诚的《如何正确评价〈甲申三百年祭〉》、刘思久的《〈评〈甲申三百年祭〉〉商榷》等文，从态度、方法、史料等方面提出讨论，具体分析了《甲申三百年祭》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指出它科学地揭示历史的规律，为人们提供了历史借鉴，对历史和历史人物并未“任意曲解、歪曲和篡改”，治学态度是谨严的。王锦厚的《略论对〈李白与杜甫〉的批评》等文，也指出《李白与杜甫》写作态度是严肃的，对李杜的评价作为一家言尚可成立，该书“敢于打破因袭的见解”，经过考证，“解决了或接近解决了一些前人或同时代人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能令人满意的难题”，提出了“一大堆供人们思考”的问题，具有学术价值。同时，这些文章也不掩饰郭沫若在引用史料和评价杜甫等的个别错误。

其次，争论较大的是郭沫若前期思想和作品中的泛神论问题。一种影响较大的看法是楼栖的《论郭沫若的诗》。他认为泛神论是诗人当时世界观“最